

AI辅助学习,孩子“学会了”还是“学废了”?

□ 赵鹏

当人工智能逐渐渗透进孩子的作业中时,“AI代写”现象引发的争议正在教育领域掀起波澜。小学生用AI生成阅读解析,初中生借智能工具完成作文框架,高中生靠算法攻克数学难题……技术浪潮裹挟着便利与隐患同时到来,我们不得不思考:在AI重构学习方式的当下,孩子究竟是借力成长,还是在技术依赖中逐渐“学废”了?

从积极角度看,AI确实为教育打开了新视界。AI就像一个超级智能的“学

习小助手”。它可以根据每个孩子的学习情况,量身订制学习计划,就像一位贴心的私人教练。比如,孩子数学题做错了,AI不仅能指出错误,还能推荐类似的题目让孩子巩固练习。这种个性化学习,确实能让孩子们学得更快、效果更好。

但“硬币”的另一面却让人担忧。某教师批改寒假作文时,发现半数学生提交的排比句呈现出惊人的程式化特征,追问之下才知是AI生成的“考场作文模板”。更令人忧虑的是,部分学生开始用“拍照搜题—复制答案—清除使用记录”

三部曲完成作业,这种技术依赖正在消解深度学习所必需的思维耐力。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技术的场景与方式。当AI沦为逃避思考的“枪手”,它便成了思维惰性的催化剂;但当其作为拓展认知的“脚手架”,却能激发更高阶的创造力。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开展的PDC实践项目或许可以参考:该学校的孩子们借助AI分析社区垃圾数据,再通过线下调研验证算法结论,这种虚实结合的学习模式既利用了技术优势,又守护了实践智慧。

站在教育变革的十字路口,或许我

们该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禁止孩子接触AI如同因噎废食,但完全放任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退化。关键是要建立“技术中介”思维——就像望远镜延伸了人类视野却不能替代观察本能,AI应当成为辅助思考的认知工具而非思考主体。这需要家校共同构建新的教育契约:教师设计需深度思考的开放性课题,家长设定合理的技术使用边界,让孩子在“人机协同”中既享受技术红利,又保持思维活性。唯有如此,AI才能真正成为启迪智慧的钥匙,而非禁锢思想的牢笼。

媒体观点

医美也有托儿? 斩断利益链刻不容缓

□ 张淳芝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消费者辛某原本只想在一家美容院做皮肤清洁护理,却遭遇一家医美机构设下的“引流—转化—收割”连环套。涉事医美机构预先安排“美托”,按照“剧本”“话术”,精准“围猎”目标顾客。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达2700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约10%。行业的高速增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一些医美机构采取不正当营销手段,比如用“美托”诱导客户。据报道,医美属于暴利行业,“美托”的提成比例普遍在50%,利用“剧本”和“话术”围猎消费者的行为,成为医美机构和“美托”之间的利益合谋。治理“美托”类乱象,一方面,有关部门应积极通过接受群众投诉、奖励“吹哨人”等途径,及时查处“美托”行为,构成犯罪的追究刑责;另一方面,消费者要增强自身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让有关机构实施侵害前掂量掂量后果。 据《工人日报》

AB制午餐 “要我吃”变“我要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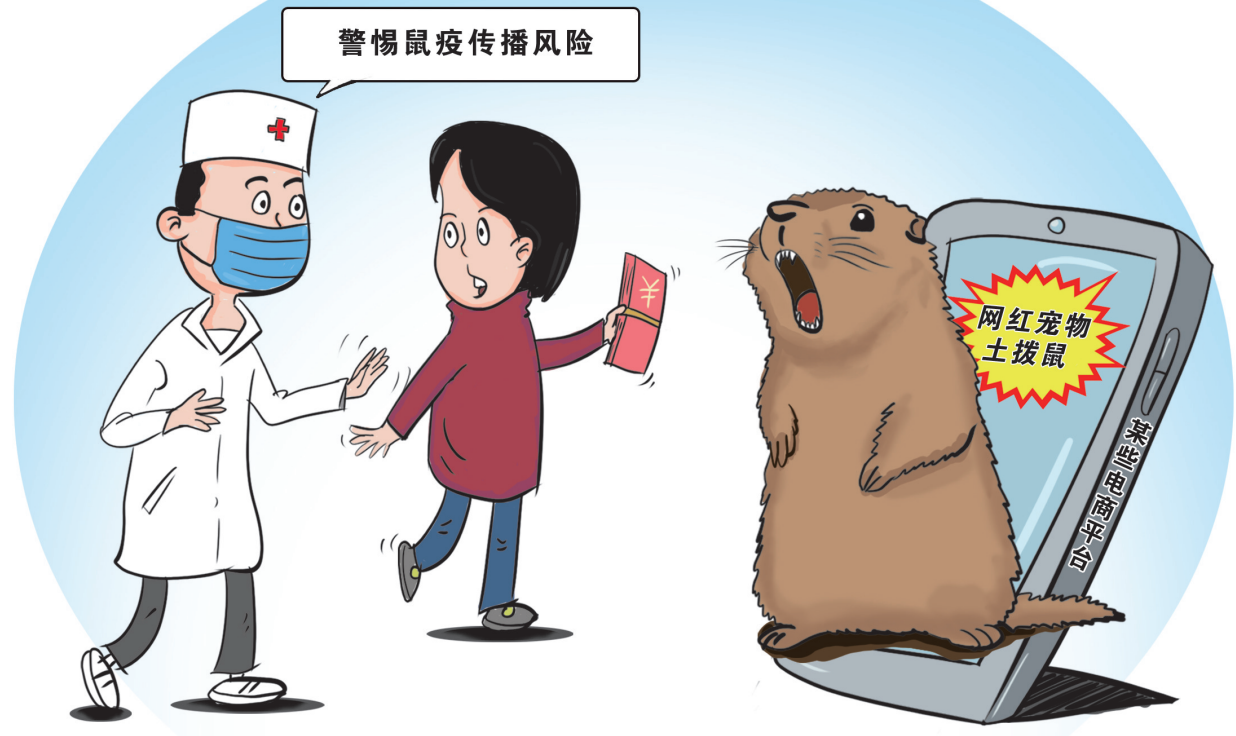
□ 项向荣

从去年秋季学期起,上海逐步在各中小学校推行AB制学生午餐,每日提供至少两种套餐组合方案供学生自主选择,以提高用餐质量。到今年,上海市中小学校已基本实现AB制午餐全覆盖。

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AB制午餐模式提供了两种以上的套餐选择,体现了学生饮食的多样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餐食,从“要我吃”到“我要吃”,在菜品种类大幅增加的同时,食堂里的剩饭剩菜明显减少,在节约粮食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对于正处在成长关键期的中小来说,食品的质量与安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AB套餐制体现了教育系统在细节上的关怀与进步。这种创新的学校餐饮服务模式,还蕴含了“儿童友好”的理念,给孩子充分的参与和选择权。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校园午餐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未来校园餐饮服务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据《钱江晚报》

画里画外



网购土拨鼠?别为好玩忽略安全

辛政 作

有一说一

“AI公务员”上岗,该关注什么

□ 刘亚杰

前不久,深圳市70名“AI公务员”上岗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随着AI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渗透至各种公共服务核心场景,尤其在政务服务中深受追捧。不过,在笔者看来,人机协同的政务革命背后,效率提升与人文关怀、技术创新与伦理风险等问题也亟需深思。

当下,AI智能政务服务场景越来越多。在北京中关村街道,“关芯客服”几秒钟就会给出居家养老方案;在上海市普陀区,“百事能”已渗透进社区工作的方方面面;从长三角的“一网通办”到粤港澳的“秒批系统”,人工智能正以每月迭代的速度重塑政府治理模式。AI技术不断突破值得欣喜,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深思。在某地,AI系统因无法识别手写补充条款导致业务延误;老年人面对智能

终端时有些茫然无措,“健康宝”数据泄露事件暴露出系统性风险;更关键的是,当AI开始参与资格审查等具有裁量权的工作时,算法黑箱会不会衍生出新型“数字官僚主义”更值得关注。

不过,杭州“城市大脑”项目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样本。其采用“AI预审+人工复核”的双轨机制,在交通违法处理等场景中,将简单案件分流至AI系统,保留10%的疑难件由人工集中处理。这种模式既节省了人力资源,又通过人机校验机制控制了风险。在成都市,“算法治理市民议事厅”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可视化呈现决策逻辑,组织公众参与算法参数调整。这种“可解释AI+参与式治理”模式,正在重塑技术时代的政民互动范式。在深圳,福田区首创政务辅助智能机器人“基本法”,以政府采购、使用的政务辅助智能机器人的全流程管理为主线,构建伦理框架,明确了技术标准、应

用范围、安全管理以及监管要求。这就为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运行厘清了边界,为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工作作出新的尝试。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在政务服务AI系统中嵌入“人工优先”触发机制,当检测到服务对象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时自动转接人工服务;建立算法决策追溯系统,让每个“AI公务员”的“思考过程”都可查询、可解释;更重要的是构建人机能力互补的培训体系,让公务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转向更需要人性温度的工作。

站在技术革命的临界点,“AI公务员”不应是冰冷的技术替代,而应成为提升治理温度的数字助手。当“AI公务员”精准快捷地为群众办事、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展现微笑时,这样的场景才真正诠释了“科技向善”的本质。